

花蓮豐田社區史的後殖民論述與遺產論述

張育銓*

摘要

後殖民論述中有關被殖民者積極對歷史重新詮釋的探討，延伸出對殖民者的定位、對殖民歷史的建構以及如何重寫殖民歷史等議題，並以國族論述的視野，在政治、經濟、醫療、文化與人口政策上，討論殖民與後殖民的糾結。本文從台灣東部農村社區的案例，以當地最具在地認同的物質發現史，將後殖民論述與遺產論述進行連結，說明地方的歷史詮釋如何建構，並成為日常生活與地方認同的一部分。根據史料分析與田野訪談發現，這樣的歷史詮釋是為了因應解殖的需要，由地方菁英帶入原本殖民者刻意塑造對地方的認知與認同架構，在解殖的動機下，卻形成內部殖民。筆者自 1998 年起在豐田社區從事人類學式的田野工作，本文以田野資料配合文獻分析與訪談，思索一個社區如何對歷史真實性與創造性加以運用與實踐，以達成對解殖的想像。

關鍵詞：後殖民論述、遺產論述、豐田社區、花蓮

*台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副教授

壹、後殖民論述、遺產論述、豐田社區

一位在花蓮縣壽豐鄉豐田社區長期從事社區營造工作，並且在社造團隊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地方菁英，曾經在不同場合中多次提到：「豐田的文化需要去殖民」。這句話呈現出一個積極經營社區的地方菁英，試圖透過殖民與解構的角度重新認知地方文化，其中「豐田文化」與「去殖民」是兩個主要元素，分別代表著遺產與殖民的概念。對於以日本移民村做為地方最大特色，也是最主要遺產的豐田社區來說，這樣的一句話引發筆者試著從「殖民」與「遺產」的角度，重新檢視社區菁英如何透過社區營造重新建構的豐田的社區史。

二次大戰後，許多國家陸續脫離殖民統治，過去的殖民經驗透過不同形式仍然持續產生作用，這樣的歷程便是進入後殖民時期。許多國家爭取民族獨立以及發展民主政治與獨立經濟體的歷程，經常借助甚至仰賴殖民國家的資源，因而無法擺脫過去殖民經驗的影響與制約，產生殖民延續的後殖民現象。Edward Said (1978) 認為，殖民不只是歷史上某一時期的帝國武力統治事實而已，即使武力退位，不平等的地位仍繼續存在。因此，對 Said 而言，殖民只是改以其他的形式展現的優勢與霸權。正如 Albert Memmi (1968: 88) 提到：「我不認為壓迫停止的那一天，就是新人出現的那一天。事實上，不僅如此，在我們看到那個真正的新人之前，被殖民者還將存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也就是說，許多國家在後殖民時期的發展狀況，處於獨立與依賴的過渡狀態，許多殖民時期的知識體系與思維模式仍然是公共事務的運作原則，這樣的知識與思維運作，在某一個層面上印證了 Said (1978) 所提到被殖民者「可怕的從屬性」(dreadful secondariness)；不僅在政治、經濟的依賴關係中，也表現在教育、藝術、主體文化認同，以及對公共與文化事務的認知與執行等微觀層面。後殖民論述 (postcolonial discourse) 正是面對這樣的發展狀況積極思索主體文化建構、族群身分認同，以及如何重寫殖民歷史等問題，而遺產正是同時交雜著主體文化建構、身份認同與歷史詮釋的議題。因此，將後殖民論述與遺產論述 (heritage discourse) 進行連結，可以進一步呈現並釐清後殖民時期，殖民經驗如何持續運作、如何反抗以及人們如何創意面對等問題。這正是本文透過豐田社區史所要連結的探尋，期待可以在後殖民論述與遺產論述的釐清中，透過對社區遺產的歷史詮釋找到社區的主體與認同。

遺產是一個來自過去的當代產品，透過遺產人們與過去產生連結 (Harvey 2001: 327, 332)，並成為集體或個體認同的媒介 (Hewison 1989: 170)。本文採用 Tolina

Loulanski(2006: 207-233)對遺產的定義，他認為遺產的概念承載兩種不同的意義；在正面的部份，遺產是為了瞭解文化與地景，都是社區所關切的事情，保留人們所需的歸屬感與認同感，並傳承到下一世代。在負面的部份，遺產是一種經過試鍊後的遺產產業(heritage industry)，它變成一種為商業目的，對過去進行開發與操控。這樣的定義可以在思索遺產的詮釋時，保持更為謹慎的態度。遺產是居民用來確認地方特色與地方史的重要參照對象，Laura Jane Smith (2006: 304) 強調，遺產是情緒與權力的文化指導過程，透過個人與社會的行動，產生對過去與現在的理解，也包括對未來的規畫與想像。尤其遺產並不是從過去無縫地繼承，而是為了當代的特定目的，由現在選取與過去之間的連結而生產 (Graham, Ashworth, and Tunbridge 2000)。遺產在特定的歷史詮釋下構成一套遺產論述，本文採用Smith (2006) 對遺產論述的看法，她認為遺產論述是調節文化變遷以及維護、協商與確認特殊認同與價值的過程，關注於物質性以及物質文化與認同之間的再現關係，也關注存在於與認同政治相連結的多元社會衝突與緊張。因此，Smith將遺產視為文化實踐，包含價值與理解的建構，遺產的真實性取決於人們有意識地在日常生活中對它的建構。因而，Smith認為是遺產論述製造遺產，遺產論述成為建構文化價值與意義的過程，尤其透過掌握詮釋權的地方菁英，創造出對遺產的歷史詮釋。許多案例呈現，從殖民歷程中獨立的國家，透過遺產的歷史詮釋來強化自身的文化認同。如印度透過對泰姬瑪哈陵大理石外牆維護技術的考古探索，擺脫過去殖民國家所提供效果有限的技術，建立起屬於自己的遺產維護方式與歷史詮釋 (Edensor 2004)，而肯亞則是將馬賽傳統文化發展成不同性質的觀光類型，接待來自殖民國家不同喜好的觀光客，建構出屬於自己對傳統文化與全球化的新認識 (Bruner 2001)。因此，在後殖民論述中，遺產論述成為呈現文化政治以及歷史詮釋具體化的重要載體。

台灣的遺產意識正逐漸提升，在文化政策與政治經濟利益下，發展出不同型態的遺產論述，而台灣的後殖民狀況也持續進行著，為了將遺產論述與後殖民論述進行連結，本文以花蓮的豐田社區為案例，探討社區菁英如何透過當地遺產建構一套對社區歷史的重新詮釋，並且探討這樣的詮釋手法是邁向解殖 (de-colonization) 或再殖 (re-colonize)，或者展現出對歷史詮釋具創意的新可能性。

豐田社區隸屬花蓮縣壽豐鄉，位於花蓮市南方 25 公里的花東縱谷中，西為中央山脈，東臨花蓮溪，南靠壽豐溪，北接壽豐村；面積約為一千公頃，是壽豐

鄉最大的腹地所在(花蓮縣壽豐鄉公所 2002)。豐田社區由五個村落組成(豐山、豐裡、豐坪、溪口、樹湖)，共有 2,308 戶，人口 6,524 人，約占全鄉人口的 36% (花蓮縣壽豐鄉戶政事務所，2014)。豐田因殖民、開墾、採樟、採玉、八七水災等歷程，帶來多次移民潮，人口組成相當多元。族群以客家人最多，約佔 65%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2010)，其次為閩南人與原住民族各約佔 15%，及外省人、新住民與新移民，這些不同時期與不同動機的移民，在豐田社區激盪出多元文化的容貌。

筆者從 1998 年起持續在豐田社區從事田野工作，在累積多年的觀察與訪談中，許多社區居民普遍認為豐田社區最重要的遺產就是日本移民村與豐田玉。

台灣總督府選定東台灣九處規畫設立移民村，其中三處位於花蓮港廳，大正一年(1912)成立的豐田村是日本人在台灣建立的第二個官營移民村(台灣總督府殖產局 1919:44-57)，也是目前保留較為完整的日本移民村，社區內許多日本建築的遺留構成最鮮明的文化地景，如移民指導所之事務所辦公室、警察官吏派出所、醫療所、小學校禮堂、豐田神社、地神、移民墓區、豐田圳、山下私設埤圳碑、菸樓等¹。儘管日本在 1945 年撤退，從居民在日常生活實踐產生的延續性來看，日本時期的空間規劃、土地使用、電力設施、灌溉水圳、聚落房舍、農田配置、農作物種類、山林使用、道路交通系統、礦物開採、信仰中心、主要地景等，仍都持續運作著，並與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在殖民時期，因殖民政策與擔任僱工的關係，台籍居民的日常生活深受日本文化影響。終戰後仍依循殖民時期的基礎建設與農田水利規劃，持續社區日常生活²。歷經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zation)的經驗，伴隨同化與皇民化形塑特殊的文化認同，居民一方面以日本規劃的空間與房舍格局過著台式生活，另一方面地方菁英透過社區總體營造(簡稱社造)積極尋找屬於東部的移民社會特色，這些在日常生活中的跨文化實踐(cross-cultural practice)，更進一步形塑出豐田社區跨文化的多元認同(張育銓 2012: 114)。

豐田社區另一項重要遺產為豐田玉，又名閃玉，其獨特的發展歷史以及對社區帶來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影響，使豐田玉成為許多居民認同度極高的遺產，這樣的遺產認同同時包括玉石的物質與地景層面，以及非物質的記憶與技藝層面。

豐田玉從日治時期開採後，1975 年達到 1,461 噸的產量，佔當年全世界產量

¹參見張育銓(2012: 114-158)對上述日本建築的文化地景分析。

²參見張育銓(2012: 65-83)對豐田社區的歷史發展階段區分，尤其日本移民村中的日常生活延續，並非以政權統治為的歷史時間劃分。

的 90% (台灣省礦務局 1997:39)，整個豐田社區因為豐田玉整個活絡起來，當時有花蓮小九份之稱。在歷經石油危機的景氣衝擊以及以炸藥爆破取材導致玉料品質不佳等因素，自 1980 年起進口商引進價格較低且品質較好的加拿大與西伯利亞玉之後，豐田玉迅速於 1983 年停採 (魏稽生、譚立平 1999: 181；翁林廷彬 2007:79-81)。近年來，在觀光紀念品的形象包裝以及藝品大賣場的團客促銷策略下，豐田玉改名為台灣玉，成為外國觀光客到花蓮的必買紀念品之一。隨著消費熱潮，以及爆發幾次真假玉石的爭議事件之後，豐田玉的發現史再度成為討論的議題。相對於玉石業者的行銷取向，推動社造的地方菁英建構一套具有解殖意涵的遺產論述，這套遺產論述不僅成為社區內的主流說法，也透過出版、社區觀光的導覽解說、觀光客的網路遊記、社區國小的鄉土教學，不斷將這套論述傳遞與複製。然而，逐漸有許多居民已經開始對這套歷史詮釋產生質疑，這樣的質疑令後殖民論述與遺產論述產生交集的機會。基於後殖民論述代表一種「反殖民」與「反知識霸權」的力量，以下從豐田玉發現史著手，從後殖民論述與遺產論述的角度，分析社區菁英對社區歷史的建構與詮釋。

貳、豐田玉發現史的建構與詮釋

在社區導覽以及鄉土教學中，對於豐田玉的發現史經常呈現的說法：日本人不識玉，甚至視為廢石棄置山谷。這樣的說法經過社區出版品與網路傳播，已經逐漸成為對豐田玉發現史的主流說法。以下透過歷史文獻的對比分析，將這套論述背後的歷史詮釋與具解殖意涵的後殖民論述呈現出來。

目前對豐田玉發現史的說法如下：昭和七年（1932）日本人中島氏於原荖腦山打獵時，發現山洞內有白色纖維狀的石綿礦脈露頭。昭和十二年（1937）日本人開始小規模的開採，不久即由羅東的企業家砂田鱗太郎經營，並設置「砂田石綿礦業所」。昭和十六年（1941）礦權轉移給「台灣拓殖株式會社」（簡稱台拓），並成立「台灣石綿株式會社」，設立豐田礦業所、石綿及滑石處理場。因為石綿是隔熱最好的絕緣體，屬於戰備物資，昭和十九年（1944）因應二次大戰，軍事需求量增加，礦場被日本海軍部徵用，以坑道大量開採。一塊塊珍貴與石綿共生的豐田玉原石，就這樣被不識貨的日本人視為毫無價值的廢石，棄於廢石堆中或傾倒到溪谷，無人聞問（干淑真 2006；翁林廷彬 2007；蔡萬益 2009）。

Memmi（1965）在討論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時，提到獨立後的第三世界國家經常在提及過去被殖民的歷史時，傾向將殖民者描述成對當地的豐富資源相

對無知。Memmi 這樣的觀察一方面說明被殖民者對殖民者的關注焦點在於政治面向上，另一方面也說明被殖民者透過這樣的論述取得重新建立自我認同。底下將被殖民者這樣的歷史詮釋帶入豐田玉發現史中，探討這樣的歷史詮釋中還被挾帶著哪些值得進一步分析的意義。從上述三篇文獻提到日本人與豐田玉的發現歷程時，將日本人的形象描述成具有殖民者形象的狩獵者以及不斷累積軍備從事戰爭的列強，透過這兩個形象描繪出日本殖民者的侵略性與暴力性，是在意外的歷程發現豐田玉，符合將殖民者描述成對在地豐富資源的無知。然而，這樣的歷史詮釋是刻意避開日本人對花蓮礦物的探勘歷程與豐富的礦物學知識。

日本官方與民間對花蓮地區的礦物探勘相當積極，尤其大正六年（1917）3月三菱合資會社，調查知亞干溪右岸及萬里橋溪左岸的礦物分布，在豐田的原著腦山區發現蘊藏豐富的石綿礦（花蓮縣文獻委員會 1974:41）。在台拓調查課所出版的《事業要覽》中也記載，大正七年（1918）在中央山脈東邊的蛇紋岩脈中，發現有石綿礦脈（台拓調查課 1942:21）。因此，日本人是透過地質學與礦物學知識進行探勘，發現豐田山區的礦物蘊藏量，而不是昭和三年（1928）才在狩獵時，意外發現石綿礦。日本人當時有多篇以石綿和閃玉為主題的論文發表，如在台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擔任技師的國府健次（Kono Takeji），於昭和七年（1932）發表〈花蓮港廳下產綠色角閃片岩に就て〉，指出豐田山區的綠色角閃片岩為閃玉在轉化為石綿過程的中間物。昭和十三年（1938）以〈台灣花蓮港廳豐田村西方山地生產出石綿生就〉一文，指出稱豐田山區的角閃片岩由閃玉與陽起石構成，並清楚地記錄閃玉的礦物特性。此外，曾任三菱會社礦山部技師，後來擔任臺北帝大地質學講座教授的市村毅（Ichimura Takeshi），在昭和十六年（1941）也發表〈花蓮港廳豐田村石綿鑛山〉，他在1952年以“Asbestos Deposits Of The Toyoda Mine, Hualien Province, Formosa”一文發表在 Scientific Papers of the College of General Education (Tokyo Univ.)。這些在礦物學期刊上的論文清楚地呈現出，當初不僅是投資礦業開發的公司積極探勘，在官方學術機構的學者也評估出豐田山區的礦物價值(張育銓 2012:183-185)。

在戰爭期間，日本人為何不開採豐田玉，只採石綿礦，主要是因為昭和十六年（1941）太平洋戰爭爆發，隨著各國禁止重要物資輸日，使日本國防所需的礦產更加缺乏，日本的礦物政策大幅度改變，對軍備用品原料的重視高於寶石的開採。台灣總督府配合日本國內的政策，以行政要求具有半官方性質的台拓配合，於同一年取得開採的經營權，並於昭和十九年（1944）在總督府頒布「台灣決戰

非常措置要綱」勒令一切非戰略性物質停止生產後，豐田的礦區便改由日本海軍部徵用；因為石綿是良好的隔熱材質，在軍事武器與船艦上，是防火的必需品(張育銓 2012:186)。

相對於日本人不識玉的論述，終戰後在花蓮與台北的藝品店中，最大的消費客群是日本人，豐田玉成品與半成品最主要的外銷國也是日本。在昭和七年（1932）至昭和十九年（1944）將玉石視為無用而廢棄的日本人，在回到日本之後，忽然變成懂得鑑賞並大量購買豐田玉的消費者。這樣的歷史比對，更突顯這套日本人不識玉的說法，是一項需要進一步解析的歷史詮釋(張育銓 2012:186)。

Jean-Francois Lyotard（1992）提醒，後殖民的「後」(post) 這個前綴表達了一種從頭重新開始的欲望，但是這種樂觀的烏托邦主義卻建立在對於自己歷史的可怕健忘之上，它通過記憶的缺失來形構自己的美妙未來，它不過是一種「遺忘或壓抑過去的方式」而已，是一種可怕的健忘症；然而，歷史以及歷史的影響並不會因為人們的遺忘，便不再起作用。也就是說，對歷史的遺忘是再現歷史的形式之一，使得日常生活成為論述的場域，進入解殖或再殖的論述循環。

參、遺產論述中的解殖與再殖

豐田社區的權力結構在近年內出現明顯的變化，尤其是透過社造政策直接來自中央的行政支援與經濟支持，使承接社造工作的社造團隊在地方派系外，成為新的社區頭人，夾帶著中央政府與專家輔導機制，對社區的遺產論述與歷史詮釋帶來許多影響。社造政策源於 1987 年解嚴後，政治、經濟與社會走向開放及民主化，為因應民間強大的改革與參與動力。1994 年由文建會主導推動，是一種文化向下紮根的工作，秉持由下而上、居民自主及民眾參與的精神，開啟台灣社區的多元發展，也促進地方文化的保存與推動（行政院文建會 1999）。豐田於 1997 年在文建會補助與花蓮文化局協助下，由新象社區交流協會引介東華大學教授群提供協力，成為花蓮最早投入社造的社區。透過十多年來不同社造組織的努力，為豐田建立良好的社區形象，並成為社造界的明星級社區³（曾旭正 2010；黃源協 2004:80-81）。第一波社造由 1998 年組成的豐田文史工作室主導，定位為日本移民村，以壽豐鄉文史館為據點，積極培訓社區人力並發展文創商品，形塑文化

³在社造初期政府特意培植明星級社區，經費補助往往集中在這些少數運作成熟的社造組織，且政策與法令根本無法充分要求獲得補助的社造組織落實社造精神，對許多一般社區產生相對剝奪感。明星級社區擁有來自中央政府的行政與經費奧援，越來越明星，使社區內其他組織很難找到可以持續運作的空間。

產業的雛形。第二波社造由 2001 年成立的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簡稱牛犁協會）接手，將社造重新定位為客家二次移民村⁴，以現時性拉近社區居民的關心與認同，逐漸將社區意識轉變為族群意識，也透過老人送餐、外籍配偶、青少年課輔、數位教育中心等服務，逐漸將社造轉型為社區福利工作，並擴大社區觀光的經營層面，累積一定的政治與經濟影響力，取得社區代言人的角色（張育銓 2012：106-109）。

李文正（2006:107-108）在牛犁協會推動社區林業中觀察到，社區發展方向的決策，大部分是由社造團隊選取社區民意及主觀的組織理想來主導，許多社區計畫中所謂的「居民參與」應該大多只是處於「社區參與」或者「社區組織參與」的層次。這種形式的社區居民參與，比較像是間接代議的形式。尤其社造團隊公司化與專職化後，對居民而言，並不是參與感的消失，而是參與層次的相對剝奪（張育銓 2012:94）。因此，社造團隊在許多層面上，並不等於社區居民，尤其從上述社區菁英建構豐田玉發現史來看，社造是個人記憶形塑集體記憶的過程，社造組織主導者透過「被授權的遺產論述」（authorised heritage discourse）⁵所扮演的主導性，將自己的歷史觀念與遺產論述強加到集體記憶中，尤其社造組織主導者缺少在地經驗，或對居民所共享的集體記憶有著不同的看法與詮釋時，這樣的歷程則更加明顯。

透過豐田玉發現史的歷史詮釋來看，兩個社造團隊刻意建構新的社區史，做為建構認同與解殖的基礎。誠如一位長期主導豐田社造的菁英在許多場合提到：「豐田的文化需要去殖民」，因而在他所籌辦的社區活動中，看不到日本時期的產業與文化，更將豐田從日本移民村重新界定為客家二次移民村，透過終戰後的客家族群，做為重新認識豐田歷史的新架構。再加上透過鄉土教學、社區出版品、社區導覽、網站媒體傳播中不斷建構「日本人不識玉」、「豐田是土地豐饒又多水田」的歷史詮釋，這樣的歷程正是地方菁英透過社造政策，讓歷經殖民的居民從解殖的歷史進入再殖的社會現實。

正如 Said（1994：254-255）認為，後殖民時期民族資產階級繼續延用殖民者所建構的神話來支配被統治者的意識。Aijaz Ahmad（1992:68）也指出，第三世

⁴豐田社造組織對客家二次移民村的論述僅探索客家移民的開墾歷程以及祖籍分布，主要引用西部客家文化特色來形塑客家二次移民村的文化內容，尚未針對客家在花蓮所發展出的在地特色進行探討。

⁵被授權的遺產論述(authorised heritage discourse)概念，意指優勢團體會強加一定的意義與價值在遺產的保存與再利用上，有時會包括其他團體的看法，但更重要的是，排除其他團體的意見，藉由取得遺產論述的詮釋權進而掌握遺產的資本形式(Smith 2006)。

界國家獨立運動的結果，往往是殖民地的資源為本土中產階級所接收，弱勢團體並未蒙其利。豐田社區目前的遺產論述大多來自地方的社造菁英，他們自社造政策中，獲得來自中央的行政支援與經費資源，成為政府與居民之間的微型政治體（張育銓 2012），取得地方菁英的位置與實質權力。Said（1994：307-308）提到，許多脫離西方殖民宰制的大眾，在擺脫一種殖民權力關係後，卻又陷入另一種新的內在殖民權力關係；這時候，殖民主宰不再是西方白人，而是本土的統治菁英，以一套教條化的本土主義意識型態來掌控文化論述。社區的文化精英將傳統文化轉化為象徵性資本（symbolic capital）（Bourdieu 1986）。傳統文化透過語言溝通和身體表演的媒介表達符號意義，在持續溝通和協商的實踐過程，透過各種媒介與策略累積傳統的象徵性資本，主導了社群傳統文化價值意義的詮釋，從而維持了相對權力的優勢位置，呈現出 Said（1978）提到，殖民者為其殖民地人民創造傳統，以維繫不平等的權力關係。

前述提及，Smith（2006）將遺產視為文化實踐，遺產的真實性取決於人們有意識地在日常生活中對它的建構。那麼，為何要建構這樣的豐田玉發現史，從後殖民的角度來看，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的糾結，並未因殖民的消褪而分開，反而是相互含混、關係不斷（Young 1990:122）。在後殖民時期，地方菁英開始思索主體文化建構以及如何重寫殖民歷史等問題（邱貴芬 1992:154-155），將日本人視為非專業，也不懂玉石價值的論述方式，成為一種對民族自信心建立的有效論述策略。同時，也反應出在美援時期，透過美國學者認證做為台灣人自信心的來源，成為獲得國際認可的管道。因此，確實可以為解殖的需要，將日本人的礦物知識與對豐田的貢獻進行掩飾，然後透過塑造一個英雄，讓大家從殖民歷史中解放出來，顯示出這套遺產論述在後殖民中的弔詭，誠如 Memmi（1965:145-149, 196-201）認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處於一種相互依賴的狀態（in-betweenness），殖民化創造出被殖民者，也創造出殖民者。殖民者會以自身的經濟利益和基本需求為邏輯，塑造被殖民者的虛構形象，並解釋被殖民者特徵的看法，就算特徵之間有所矛盾，殖民者也不以為意。誠如 Memmi 提到，被殖民者把所有殖民者都加以否定，被殖民者的民族主義不是侵略的，而是自衛的，民族主義確實含有仇恨的消極力量，但這種心理可以轉化成被殖民者重新建立自主能力的積極力量。然而，如果我們不面對歷史發展，卻只是複製著用殖民者的手法來解構殖民，距離解殖的期待恐怕遙遙無期。

後殖民論述試圖達成政治獨立之後的社會解放與文化批判，為達成此一目

標，後殖民論述選擇歷史詮釋作為主要的介入場域。從當代政治的觀點對本土殖民/反殖民經驗所進行的歷史再詮釋，在某個意義上，是一種「記憶的政治」(politics of memory)或「文化的政治」(politics of culture)的激進書寫型式(吳叡人 2006)。但是，這樣的後殖民論述也許有效建立自信，卻是建立在誤解殖民者的立場與用心，誠如姚人多(2001:134)批駁 Said 的說法，認為日本殖民政權並不如 Said 所說是一種錯誤的再現，反之，是極力追求「事實」與「真理」的。姚人多認為，殖民依賴的是一種政治理性，而不單只是把被殖民者貶為異己的想像；相反地，是科學的、統計的、數字的，是一整套精確的數字化和分類法。搭配政治理性的正是一套以無功利的文化啟蒙的面目出現的權力運作，Michel Foucault (1980:98)指出，權力的運作經常透過一系列令人迷惑的「自我包裝」，權力可能透過強力的展示與實施而表現自己，它更可能透過似乎是超越的、無功利的文化啟蒙的面目出現。透過這樣的包裝，權力既作為政治的限制又作為文化的可能性而把自己呈現出來。尤其，最有效的權力運作是通過其對象的協作(collaboration)來實施的，Said (1994)強調殖民到後殖民時代的歷史連續性，以及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的弔詭關係，西方的主體意識是如何依賴於殖民他者的現身，因此形成所謂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重疊的疆域、交織的歷史」(overlapping territories, intertwined histories)，呈現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互賴關係，以及從殖民到後殖民時期的歷史延續性。

然而，相對於社區菁英透過遺產論述對社區歷史重新詮釋，許多社區居民透過口傳歷史與自己日常生活經驗，正逐漸開展出不同的歷史詮釋。正如 Foucault (1980:138-142)認為，社會中永遠存在一種庶民的面向，是權力關係無法全然掌控的。這種庶民的面向並非處在權力關係之外，而往往出現在權力關係的極限或臨界點，以一種逸逃的方式(movement of disengagement)回應權力的侵進，只要有權力關係存在，就有抗拒。當然，要全然顛覆權力關係是不可能的，但是，權力關係中總有一些讓這種關係不那麼穩定的東西存在，這些產生抗拒能量的東西往往是在地而局部的(Taylor 1986:95)。Arjun Appadura (2000:5-6)提到，資訊媒體的發達促使想像力平民化；想像力深入一般庶民日常生活當中，激發一般人民對現狀的反省，引發對新的社會生活形式的願景。同樣的，邱貴芬(2003:61)認為每個社會所普遍信服的「真理」其實是一種知識的系統，這個系統把各類知識分類並加以排列位階，在這過程當中來決定哪些知識可算是「真的」，哪些是「假的」(Foucault 1980:133)，在地的、庶民的知識通常被編派到這套系統的

低層位階。挖掘這種庶民屈從的知識 (subjugated knowledge) 並非要建構另外一種更「真」的知識，也不是說這些庶民的知識比其他的知識都還要好 (Foucault 1981: 8)，而是提供更多對主體文化建構、身份認同與重寫殖民歷史的可能性。因此，豐田社區對遺產論述的歷史詮釋必須回到後殖民脈絡中，重新檢視可能的解殖方向。

肆、非真實的創造性

從「日本人不識玉」的歷史詮釋所呈現的殖民意識來看，要達到解殖歷程仍有其難度，因為被殖民者已經將殖民者的思考模式內化。被殖民者仍能帶有殖民者長期留下的教化痕跡，被殖民者所思考與生活的都繼續在殖民者與殖民化中進行，因而擺脫不開糾纏。長久的歷史委屈使得被殖民者求償心切、焦躁不安 (Memmi 1965:193-195,202-207)。正如，Memmi 對被殖民者的觀察主要是透過殖民者如何自我合法化的歷程，無論在殖民角色的認定或殖民關係的制度化，被殖民者反倒成為殖民化中決定性的關鍵。Memmi 另一個對被殖民者的觀察來自被殖民者如何在被動性的角色中尋求主動性的可能，無論在同化或起義的類別中，被殖民者的能動性是曖昧而尷尬的，在心理感受與實踐行動上，同時呈現出對殖民的親近與對殖民的疏離。因此，Bhabha (1993) 透過分析殖民主義的矛盾論述模式如何建構既愛又恨的殖民主體，說明權力空間的分散和由不同中介造成的傳播以及形勢和關係的多元化，從而瓦解殖民權威的結構。而且在文化混雜 (cultural hybrid) 下，一切都消融在文化混交中，歷史變成了一堆純粹的事件和偶然性，以及透過再地化 (relocate) 的概念，被殖民者設法找出殖民關係中雙方無法掌握的含混空間，重新發展出發聲地位。也就是說，透過後殖民論述檢視導致如此變化的權力真相及相關效應，並且在文化混雜中，為自己爭取到更多的自主性與選擇權。

在豐田社區內許多實際參與過豐田玉歷史的居民，開始在社造菁英的歷史詮釋外，以當地人與當事人的親身經驗，透過在地知識與在地語彙呈現出具有創意的歷史詮釋，以下舉個幾個在提出不久後，便迅速獲得在地認同的歷史詮釋。

第一個例子，把「豐田玉」改稱為「台灣玉」。2003 年 100 多位具有玉石專業與職志的成員，成立「花蓮縣台灣玉文化會館籌備會」，這群參與過豐田玉在 1970 狂飆年代的人，希望透過新的名稱扭轉過去對豐田玉的負面印象，也希望將豐田玉形塑為產業觀光的標的，除了積極爭取將閒置的公有市場規劃為台灣玉文

化館之外，也和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財團法人石材暨資源產業研究發展中心共同推出「花蓮縣台灣玉特色產業輔導計畫」與「玉石飾品設計及製作培訓班」，逐步連結社區內的玉石藝品店與社區居民。2004年，台灣玉文化協會正式立案，配合台灣玉文化館的推動計畫，透過展示活動匯集官方和大眾對豐田玉的印象；2004年在花蓮石藝嘉年華中舉辦「豐田玉石、風華再現」特展，結合理新礦場舉辦「重返石綿山、老礦坑巡禮」。2005年結合花蓮國際石雕藝術季，展出台灣玉的珠寶創作。再加上經濟部工業局協助小型工廠轉型觀光工廠，協助規畫主題行程。台灣玉文化協會積極推動台灣玉文物館的作法，符合 Richard Sandell (2003) 在英國針對地方博物館所觀察到，透過成立協會的方式，參與社區議題，並透過當地專家確認內在的價值、融入當地人所擁有的計畫與展示、鼓勵當地人參與博物館的經營。然而，Dicks (2003) 提醒，對地方文化館的支持有時是政治的考量。確實，在台灣玉文化協會籌備台灣玉文化館的歷程中，地方經濟與政治勢力的角力，有時高過於對文化詮釋權的競爭，且源於社造團隊與台灣玉文化協會之間無法形成社區產業發展的共識，使台灣玉文化館的籌備進度受到影響。

第二個例子，以當地知識語彙認知豐田玉。相對於採用殖民者留下的空間意象以及殖民者建構的歷史觀，一位社區內從事玉石產業的耆老指出：「要理解豐田玉的位置，要到海岸山脈月眉那一邊，看過來中央山脈的走向，可以很清楚看到有兩條鯉魚在白匏溪附近交尾。靠鯉魚潭的鯉魚山是公的，頭朝北邊木瓜溪的方向；豐田這條是母的，頭朝南邊壽豐溪畔的方向；豐田就剛剛好在這條母鯉魚的肚子上，所以豐田玉也叫做『魚卵玉』。」這種以地方神話傳說搭配自然地景的說明方式，解釋了豐田坐擁寶山的地理位置，呈現出居民對豐田享有得天獨厚資源的認知方式。Edwards and Llurdes i Coit (1996:344, 358) 強調，對當地居民而言，礦區不僅是一個工作的地點，更是社區的焦點以及彼此分享不同信念與文化的地方。將豐田玉的空間意象拉回當地的詮釋，透過在地的空間解讀認知豐田玉的意涵，使得有關豐田玉的文化論述，不再僅由地方菁英主導，而是大多由實際參與者來定義。

第三個例子，承認日本人的礦物知識。以發揚台灣玉文化為終生志業的蔡萬益，以他在礦區長大的經驗，以及從他在中國石礦擔任總工頭的父親口述，他提及：「當時日本技師岡田在日記中曾有玉石的記載，但適逢戰爭，未受到重視。」（蔡萬益 2009）。蔡萬益這樣的說法，試圖在社造菁英否定日本人的歷史論述之外，證明日本人其實具有礦物知識，並懂得豐田玉的價值，只是戰爭的發生，影

響發展進程。但是，當初任職於台灣總督府以及礦業會社，姓氏為岡田的日本技師中，並沒有具有礦物學知識的人；卻有一位岡本要八郎（Okamoto, Yohachiro），他是 1905 年發現溫泉結晶礦物「北投石」的日本技師。儘管他有發表過四篇有關花蓮的礦物論文，到目前為止，尚還找不到他前來豐田探勘礦物的記錄，也找不到他的日記中有關豐田玉石的記錄。然而，蔡萬益的說法，改採正面肯定日本人的礦物知識，而不是全盤否定。

從上述對豐田玉歷史的重新定位來看，社區居民針對共同經歷豐田玉產業的技藝與記憶，在真實性之外，透過創意與再地方化呈現出不同的歷史詮釋，將地方史與解殖目的分離，建立屬於地方的特色與自信。

面對內部殖民化（internal colonization）使得解殖可能成為再殖的歷程，Fanon（1968）建議將「反殖民」轉變為不同於歐洲的創造性自主（creative autonomy），Fanon 強調「創造性」（creativity），而不是「真實性」（authenticity），不致因過於懷舊，與對於前殖民的本土社會與文化的不加批判的回歸。Bhabha（1993）則是提出「再在地化」（relocate）的觀念，認為被殖民者在後殖民時期，應設法找出殖民關係中雙方無法掌握的含混空間，重新發展出發言地位。Bhabha 認為後殖民場域並非一個固定實體，所謂的認同是以多元和流動的方式不斷演變和建構出來的，故沒有正統和一致性可言，殖民文化的呈現是混雜的、交織的，兼具本土的、外來的，是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Benedict 1983）。因此，後殖民論述的重點不在於區分判別某些事件的來源是外來抑或本土，而是檢視之所以導致我們如此變化的權力真相及相關效應，而在文化混雜中，為自己爭取到比較多的自主性與選擇權。

伍、結論

陶東風（2000:5-6）提到，殖民主義之後，獨立的民族國家經常伴隨著忘記殖民過去的慾望。這種「遺忘意志」（will-to-forget）採取了一系列歷史的形式並被各種文化與歷史的動力所驅動。後殖民的失憶（amnesia）是歷史的自我創造或重新開始的慾望的一個表徵，其目的是驅散自身所遭受的殖民統治的痛苦記憶；但是事實上歷史不能透過一種簡單的意志行為而得以自由選擇。僅僅是對殖民記憶的壓抑本身決不等於從殖民統治的令人不快的現實中真正解放出來。後殖民主義理論的價值就是重新喚起對於殖民歷史的記憶。作為對於「遺忘意志」的回應，後殖民主義可以被看作是對於健忘症的一種理論抵抗，它的理論任務是提醒人們

警惕遺忘的可怕後果。Bhabha (1993:63) 也指出：「記憶決不是靜態的內省或回溯行為，它是一個痛苦的重組記憶或再次成為成員的過程，是把被肢解的過去組合起來以便理解今天的創傷」。因此，陶東風 (2000) 提到，後殖民的遺忘或再生神話兼有壓抑與否認兩種類型。它一方面不願意回顧痛苦的歷史記憶，另一方面否認並以烏托邦的模式驅逐記憶。相應地，作為一種治療模式的後殖民論述，必須要求對後殖民狀況的重組記憶發揮兩個功能，一是要認識到舊殖民主義結束以後，殖民暴力依然是陰魂不散，無所不在，二是要透過重新喚起記憶來使得殖民的過去變得更熟悉，因而也更能把握。

本文透過豐田社區對豐田玉發現史的歷史詮釋，發現當對殖民的看法隱藏在遺產論述中，在地方菁英刻意避開殖民者的影響時，反而更加深殖民的影響，讓這樣的歷史詮釋落入後殖民論述中，產生權力失衡的不斷再現。根據觀察社區內許多傳統菁英與新興移民正透過地方歷史的史料探究與日常生活的觀察，試圖對豐田社區從日本移民村至今的延續中尋找新的歷史創意，不刻意以解殖為目的，並重新審視由社造菁英提供的歷史詮釋，這股在社造的架構外，回歸殖民歷史與社區文化延續性的取向，以日常生活脈絡為重心逐漸發展出屬於在地的社區觀點。

參考書目

- 干淑真，《花蓮豐田玉的開發與地方社會變遷之研究》，台北：花蓮教育大學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 市村毅(Ichimura Takeshi)，〈花蓮港廳豐田村石綿鑛山〉，《鑛業》18(1)：26-30，1941年。
- 市村毅(Ichimura Takeshi)，〈花蓮港廳豐田村石綿鑛山〉，《台灣鑛業會報》203：30-38，1941年。
-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台灣社區總體營造的軌跡》，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9年。
-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後山客蹤：建構豐田三村客庄遷移記錄》，台北：客委會，2010年。
- 台灣省礦物局，《世界重要寶石產業資源資訊系統之建立》，1997年度大理石(石材)礦源礦場及加工調查輔導規畫計畫報告，1997年。
-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台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台北：台灣總督府，1919年。
- 台拓調查課，《事業要覽》，台北：台灣拓殖株式會社，1942年。
- 李文正，《豐田地區社區林業之發展》，東華大學自然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 吳叡人，〈台灣後殖民論綱：一個黨派性的觀點〉，《天下、東亞、台灣》，思想編委會編，頁93-103。台北：聯經出版社，2006年。
- 花蓮縣文獻委員會，《花蓮縣志：卷一，大事記》，花蓮：花蓮縣文獻委員會，1974年。
- 邱貴芬，〈「發現台灣」：建構台灣後殖民論述〉，《中外文學》21(2)：151-167，1992年。
- 邱貴芬，〈尋找「台灣性」：全球化時代鄉土想像的基進政治意義？〉，《中外文學》32(4)：45-65，2003年。
- 花蓮縣壽豐鄉公所，《壽豐鄉志》，花蓮：壽豐鄉公所，2002年。
- 花蓮縣壽豐鄉戶政事務所，〈壽豐鄉人口統計〉。<http://www1.hl.gov.tw/hr/popubrow.asp?dept=974>(瀏覽日期：2014.05.22)。
- 姚人多，〈認識台灣：知識、權力與日本在台之殖民治理性〉，《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42：119-182，2001年。

曾旭正，〈農再條例大家談〉。http://www.dfun.com.tw/?tag=曾旭正(瀏覽日期：2010.04.09)。

陶東風，《後殖民主義》，台北：揚智，2000年。

張育銓，《社區總體營造脈絡下的觀光發展：花蓮豐田社區的觀光人類學分析》
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年。

國府健次，〈花蓮港廳下產綠色角閃片岩に就て〉，《台灣地學記事》3(10-11)
：105-107，1932年。

國府健次，〈台灣花蓮港廳豐田村西方山地生產出石綿生就〉，《地質學雜誌》
45(537)：505，1938年。

國府健次，〈台灣花蓮港廳豐田村西方山地に産する石綿に就いて〉，《岩鑛》
20(2)：71-80，1938年。

翁林廷彬，〈台灣玉史〉，「2007年資源與環境學術研討會」大漢技術學院主
辦，2007年5月。

黃源協，〈社區工作何去何從：社區發展？社區營造？〉，《社區發展季刊》107：
78-87，2004年。

蔡萬益，〈台灣玉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展望〉，http://www.stoneart.url.tw/sub03/
sub03_show.php?sn=36(瀏覽日期：2009.09.08)

魏稽生、譚立平，《台灣非金屬經濟礦物》，台北：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1999
年。

Ahmad, A. *In Theory: Classes, Nations, Literatures*. London: Verso, 1992.

Appadurai, A. "Grassroots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search Imagination". *Public Culture*, 12(1), 1-19, 2000.

Benedict, A.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Bhabha, H.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3.

Bourdieu, P.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J. G. Richardson, Ed., Richard Nice, Trans. New York :Green Wood Press, 1986.

Bruner, E. M. "The Masai and the Lion King: Authenticity, Nat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 in African Tourism”. *American Ethnologist*, 28(4), 881-908, 2004.
- Dicks, B. “Heritage, Governance and Marketization: A Case-Study from Wales”. *Museum and Society*, 1(1), 30-44, 2003.
- Edensor, T. Reconstituting the Taj Mahal: Tourist Flows and Glocalization. In *Tourism Mobilities: Places to Stay, Places in Play*. Mimi Sheller and John Urry Eds., pp.103-115. London: Routledge, 2004.
- Edwards, J. A., and J. C. L. i Coit “Mines and Quarries: Industrial Heritage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3(2), 341-363, 1996.
- Foucault, M.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Colin Gordon Ed.,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
- Graham, B. J., Ashworth, G. J., and Tunbridge, J. E. “A *Geography of Heritage: Power, Culture and Economy*. London: Arnold, 2000.
- Fanon, F.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Constance Farrington, trans,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 Harvey, D. C. “Heritage Pasts and Heritage Presents: Temporality, Meaning and the Scope of Heritage Stu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7(4),319-338, 2001.
- Hewison, R. Heritage: An Interpretation. In *Heritage Interpretation. Vol I. The National and Built Environment*. D. L. Uzzell Ed., pp.15-22. New York: Belhaven Press, 1989.
- Ichimura T. (市村毅) “Asbestos Deposits Of The Toyoda Mine, Hualien Province, Formosa”. *Scientific Papers of the College of General Education*, 2(1), 99-115, 1952.
- Ichimura T. (市村毅) “Asbestos Deposits Of The Toyoda Mine, Hualien, Taiwan”. *Bulletin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1(1), 26-27, 1953.
- Liotard, Jean-François Answering the Question: What is the Postmodern? In *The Postmodern Explained to Children*. Sydney: Power Publications, 1992.
- Loulanski, T. “Revising the Concept for Cultural Heritage: The Argument for a Functional Approa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 13,207-233, 2006.

Memmi, A. *The Colonizer and the Colonized*. London: Earthscan, 1965.

Memmi, A. *Dominated Man: Notes Toward a Portrait*. London: Orion Press, 1968.

Said, E. *Orientalism*. London: Routledge, 1978.

Said, E.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Sandell, R. "Social Inclusion, the Museum and the Dynamics of Sectoral Change".
Museum and Society, 1(1), 45-62, 2003.

Smith, L. *Uses of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2006.

Taylor, C. Foucault on Freedom and Truth. In *Foucault: A Critical Reader*. David
Couzens Hoy E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1986.

Postcolonial Discourse and Heritage Discourse on the History of the Fengtian Community in Hualien, Taiwan

*Yu-Chuan Chang**

Abstract

Postcolonial discourse explores the colonized people's proactive re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extending to issues such as determining the colonists' position, construction of colonial history, and how colonial history can be rewritten. In add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ism, the interrelatedness of colonization and postcolonization on politics, economics, health, culture, and population policy are discussed. This paper explores a rural community in Eastern Taiwan as a case and examines the history of materials that locals were most familiar with in order to integrate postcolonial discourse and heritage discourse and to explain how the interpretation of local history has been constructed and has become a part of everyday life and local identity.

The analysi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field interviews revealed that the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was a reaction to demands for decolonization, through the local elite introducing the framework of local recognition and identity that the colonists initially intended to create. However, this motivation for decolonization resulted in internal colonization. This paper further speculates on how a community can apply and practice history's authenticity and creativity to achieve the imagining of decolonization.

**Keywords: postcolonial discourse, heritage discourse, Fengtian community,
Hualien**

*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ublic and Cultural Affairs, Associate Professor